

殷商統治者屬外來的人種

——試論在中華文明形成階段中族群的多元性

郭靜云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提要

近幾十年考古發掘顯示，長江、淮河、漢江流域是國家文明最早形成的地區。在距今5000餘年前的漢江下游地區，已有許多大小城邦存在，他們彼此互相結合，形成城邦聯盟的國家結構，同時，在華北地區，反而可以觀察到族群流動不穩定的情況。然而，到了距今3500年前左右，殷墟建都後，華北族群便逐步掌握了政權，使得南方文明在後來傳世文獻所載的「正統歷史」中，故意被敘述為次要的、非主導性的文明。

實際上，殷墟考古資料顯示了當時文明的多元性，殷墟所發現的器物來源頗廣，南跨長江，北跨草原森林地帶，西跨四川、甘肅，東到海洋。殷商時代是許多中國傳統的源頭，也有最早的漢字文明。殷商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集權大國，其跨越了族群文化的範圍，涵蓋了不同生活方式、文化傳統和語言的地域。殷商政權囊括了原有的許多城邦與國家，形成規模龐大的多元文明，是故，可以被稱為「上古帝國」。同時，殷商王族所用的新兵器、馬車等標誌物，都指出殷商統治者的文化背景並非本土的，而來自北方草原的成分很明顯。語言學的研究亦顯示，殷商語言乃是源於阿爾泰語系的母音。

郭靜云，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7鄰大學路一段168號，郵遞區號：62102；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廣州市海珠區新港西路135號，郵政編碼：510275，電郵：hisjyk@ccu.edu.tw。

本文則擬再用體質人類學的資料進行研究，呈現出中華文明之形成，與北方草原族群有着莫大的密切關係，並進一步辯證上古殷商帝國的統治者，對於黃河南岸、江河平原的先民來說，便是屬於狄戎之類的族群。

關鍵詞：殷商王族、體質人類學、殷商考古、上古族群流動、甲骨文

一、前言

從漢朝以來，形成了「漢」與「胡」相對的概念，漢帝國以內的族群被認定為「漢人」，而漢帝國境外尤其是北方的族群則被稱為「胡人」。從此以來，學者們對於中華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漢」、「胡」民族及文化互相影響、吸收甚至同化的過程，有許多相關的討論。然而，如果將「漢」、「胡」兩個概念用於先秦時代的歷史，可以發現這種相對概念的疑問之處。

自被封漢中地區的漢王劉邦得以建立大一統帝國以來，便將這個網羅了十個同、異族國邦而成之帝國命名為「漢」。雖然，確實漢朝時期的帝國政府已有意識地貫徹這個「大一統文明」的意識形態，但在兩漢時，所謂的「漢人」卻尚未帶有民族、族團或者身處同一文明圈者自我認同的意思，僅只是表達人們的國屬，如《漢書·匈奴傳下》曰：「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漢書·魏相傳》曰：「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將「漢」用以表達國屬概念，尚無民族的意味。就是因為「漢」尚未帶有民族概念，漢帝國滅亡後，「漢人」這個指稱亦沒有被繼續使用，直至南北朝末年甚至是將近隋朝時期，人們才開始重新使用「漢人」一詞，並且，「漢人」的詞義發生了轉變，不再是最原始的「漢帝國轄下國民」之意，而是轉化為同一文明圈的人，用以表達認同自我歸屬之用，如唐代司空圖《河湟有感》詩曰：「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等。由此可知，「漢」是一個跨民族、跨文化組合的大文明之自我指稱。而相對於這個自我認同的範圍之外的族群，便是所謂的「胡」。

然而，由於「漢」並非是血統意義上的族群組合，因此如果我們回到「漢」這個字義的出發點，或是狹義地僅以漢江流域先民為「漢人」的概念來看，許多先秦統治者對於漢江平原上的「漢」人而言，也就都是「胡人」了，包括在傳統上被漢文明的歷史歸類為正統權力的殷宗、周宗，在漢江人的眼中，全是自北而來、文智未開的「胡人」。

長江、淮河、漢江流域是國家文明最早形成的地區。在距今5000餘年前的漢江下游地區，已有許多大小城邦，他們彼此互相結合，形成城邦聯盟的國家結構，同時，在華北地區，反而可以觀察到族群流動不穩定的情況。然而，到了距今3500年前左右，殷墟建都後，華北族群便逐步掌握了政權，使得南方文明在後來傳世文獻所載的「正統歷史」中，被錯誤地敘述為次要的、非主導性的文明。

「商人」乃是多年以來學界再討論的問題，學者從文獻及考古角度進而

提出數種說法。^①這些說法，雖然都沒有任何一個能夠解決全部的問題，並對殷商文明的所有特色都提出圓滿的解釋，卻也各有言之成理的證據基礎。筆者認為，或許上述說法都反映了一部份的事實，但也有同樣的盲點，亦即將殷商看作由單一族群發展出來的文明。實際上，殷商是相當多元複雜的文明，不同地區的青銅文化，到了殷商時期逐漸融合成文明大國的型態。因此「商人」一詞並不妥，本文所探討的對象不是「商人」，而是確定殷商王族的屬性，並且筆者所用的「殷商王族」的意思，專指以殷墟為都城國家的王室。

殷墟考古資料顯示了當時文明的多元性，殷墟所發現的器物來源頗廣，南跨長江，北跨草原森林地帶，西跨四川、甘肅，東到海洋。這代表著殷商這個國家，其實是個跨族群文化的上古帝國。在殷商的多方面考古研究材料中，可發現只有一部份才代表著殷商王族的正統屬性。不過由於當時器物的流動率、人們的移動率都很高，可說是不同地域文明互相進行同化的大時代。在這一同化的基礎上，便形成了中華文明。

殷商時代是中國許多傳統的源頭，也有最早的漢字文明。不過，儘管如此，殷商王族所用的新兵器、馬車等標誌物，都指出殷商統治者的文化背景，與來自北方草原的「胡人」成分很明顯，中華文明之形成與北方草原族群有着莫大的密切關係。^②

20世紀上半葉，西方學者 Carl Hentze、Herrlee G. Creel 根據民族學的考察，從古今的生活方式、儀式、禮器等各方面的對照，提出殷商王族最有可能是古通古斯人種。^③ Florance Waterbury 則依據神話記載和殷商禮器與通古斯信仰、儀式對照，認為殷人文化的北方成分很高，或是古通古斯人種；筆者又認為殷商王族所崇拜的虎神，與長江族群對華南虎的崇拜不是同一來源，指涉着族群與東北虎的接觸。此外，他們的傳統中應該另有一些來自西

^① 參朱彥民所蒐集對此問題的研究回顧，見《商族的起源、遷徙與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1-185。筆者對此問題亦曾經作進一步的評論，參見郭靜云，《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刊）。

^② 有關馬車與殷商王族類和發祥地的問題，參郭靜云，〈古代亞洲的馴馬、乘馬與遊戰族群〉，《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頁184-204。

^③ Carl Hentze, *Objets rituels, croyances et dieux de la Chine antique et de l'Amérique* (Anvers: De Sikkell, 1936), 106; Herrlee G.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 A Stud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37), 105; Herrlee G. Creel,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 (First Series)* (Philadelphia: Porcupine Press, 1978), 191 & 247.

方以及長江華南的成分。^④

趙尺子從語言學的角度，認為殷商語言乃是源於阿爾泰語系，^⑤ 阿爾泰語系的族群範圍相當於古通古斯人種。其研究成果亦與前述相同。同時，歷史地理專家注意到，在距今4000-3500年間，曾發生過氣候趨向冷化及乾燥化，導致農耕衰退，而北方族群改變生活方式和向南移動，奪取南方族群的生活區域。因此在華北地區發生了非常大的族群變遷，^⑥ 而經過幾波北方族群的掌控，華北地區逐漸形成殷商語言使用者的文明。因此殷商語言使用者的族團確實有很明確的北方草原成分，且在殷商拓展版圖與族群融合的階段中，東北的成分最為突顯。直至周時代起，以殷商語言為基礎的周時期語言，便逐步吸收了藏族語言的特點，也反映了殷商之後政權中心與西邊山脈族群的關係。總體來說，語言學的研究亦顯示，上古殷商帝國的統治者，對於黃河南岸、江河平原的先民來說，可能是屬於戎、狄之類的族群。

在此問題的研究中，最直接的資料乃考古人類學對殷商大墓中的人骨研究。李濟在安陽發掘，所收集的人骨總數達幾千具。經過詳細的測量，與各人種的標準對照，其獲得結論是：「安陽的材料應是異種系程度更高的一組。」^⑦ 也就是說在殷墟墓中，各種外來人種出現率甚高。針對從西北岡祭祀坑中出土的398具頭骨（370具成人頭骨，其中319具是男性、51具是女性）的研究，也顯示非中原人的異種系人骨比例很高。

在人類歷史上，對人種的研究始終帶有政治性的「民族自我意識」觀點，尤其是在19、20世紀人種敵對中，堅持人種的純性、主導性等，成為許多人類學研究的背後意義。又因為19、20世紀中國受到高加索人種的壓迫，學者們經常不自覺地強調：蒙古人種創造了獨特的大文明。這類論述迄今依然可見，例如潘其風從舊石器時代北京猿人來探討中國本土蒙古人種的起源，甚至忽略了生物學的事實：北京猿人與智人不是同一種動物；同時，潘

④ Florance Waterbury, *Early Chinese Symbols and Literature: Vestiges and Speculation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Ritual Bronzes of the Shang Dynasty* (New York: E. Weyhe, 1942), 10-13 & 139.

⑤ 趙尺子，《「蒙漢語文比較學」舉隅》（臺北：中國邊疆語文研究會，1969），頁354-358。

⑥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鄂爾多斯博物館編著，《朱開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韓茂莉，〈論中國北方畜牧業產生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地理研究》，2003年，第1期，頁89-95；韓茂莉，〈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形成與氣候變遷〉，《考古》，2005年，第10期，頁57-67。

⑦ 李濟，《安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256-267。

其風又以蒙古人「單一元多累型」概念，來解釋新石器和三代時期各地人骨的異種性，而「西方人種」出現在中國的時間較晚。^⑧ 可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是毫無實際意義的，因為人類發展經過了多次分合階段，高加索人種與蒙古人種之間曾經多次互相影響，且相互參與不同文明的形成。所謂「漢族」是個大熔爐，同化了很多不同的族群與人種。本文對殷商統治者族群屬性的研究，將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此一東方帝國的形成。

二、體質人類學關於殷商王族主流的血統來源

根據體質人類學的假設，不同的人種在頭骨的形狀上皆有所不同，若實地加以測量，便可以發現其數據有固定的準確範圍。而根據體質人類學對殷商墓葬的研究，在殷墟墓中，各種外來人種的出現率甚高。^⑨ 因此，楊希枚從人類學角度提出疑問：「殷商王朝及其文化的締造者究竟是何許人種？是古所謂的『華夏』、『東夷』，抑是『西戎』民族？是一個同種系的(homogeneous)，抑異種系(heterogeneous)即包括若干族類而由殷王族統治的一個大族群？」^⑩ 李濟贊成「異種系」概念，他觀察到殷墟人群的多元性，有助於解釋殷墟考古遺物的多元性以及甲骨文的一些記錄，他認為：「合理的解釋是，很早以來，華北平原就是許多不同民族支系會集的場所，而原始中國人群就是部份地由這些民族集團融合而成的。雖然，我們必須記取的，即在這些支系中佔優勢的集團無疑是蒙古人種集團。楊希枚的研究和分析，有助於確切地解釋考古發掘和卜辭記錄的某些歷史事實」。^⑪ 今日，我們在多年發掘成果的基礎上，確實有必要對殷墟墓葬的人頭骨，作進一步的測量及統計研究，以便能更加了解殷商都城的人口類別。但由於目前尚缺乏對所有墓葬發現皆充分且全面進行統計的資料，因此我們先依照西北岡祭祀坑的資料討論。

⑧ 潘其風，〈關於中國古代人種和族屬的考古學研究〉，《燕京學報》，新九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277-294；韓康信、潘其風，〈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頁245-263。

⑨ 李濟，《安陽》，頁257。

⑩ 楊希枚，〈河南安陽殷墟墓葬中人體骨骼的整理和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2分（1970），頁231。

⑪ 李濟，〈關於殷商人群的體質人類學概述〉，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殷墟頭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52。

西北岡祭祀坑出土的398具頭骨，為殷代人種研究提供了頗為關鍵的自然史料。針對從西北岡祭祀坑中出土的398具頭骨（370具成人頭骨，其中319具是男性、51具是女性）的研究，也顯示非中原人的異種系人骨比例很高。對此楊希枚和美國人類學家孔恩（Carleton S. Coon）的看法一致，398具人頭骨中，一半是屬於本土的人，即華北人種。不過楊希枚認為他們未必都是河南先民，可能是源於不同種系，包括與河南人生活習慣不一致的西北人。另一半被鑑定為非華北人的頭骨，按照測量結果被分為五組如下：30具古典蒙古種（類似布里亞特、楚科奇、漠北蒙古三族類型）；34具太平洋黑人種（美拉尼西亞人、巴布亞人等）；兩具女性頭骨是高加索人種（附圖1）；50具北寒帶類古蒙古人（愛斯基摩人、印第安人等），其中一些較像古北歐洲人種（愛爾蘭人），或同屬高加索、或屬混血人種；38具未認定，以為或亦屬混血人種者。但最近 Kim Hayes 再依據新考古資料，將未定的38具與中亞草原青銅文化的人種作比較，發現他們具有相同性，也屬白人的一種（附圖2）。^⑫ 另外，孔恩認為頭骨中還有數具黃、白人種混血。人頭骨祭坑之外的大墓中，也有不同種類的人骨。^⑬ 雖然韓康信和潘其風發表過幾篇文章，目的為否定在殷商墓裡出現東亞蒙古之外的人種，^⑭ 但楊希枚和孔恩兩位學者所提供的數據和論述更加明確及可靠。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殷墟工作站對殷墟一期的遺物和人骨進行同位素測試，再次發現殷墟貴族來自各地，其中北草原的成分亦十分明顯。^⑮

針對西北岡祭祀坑的頭骨，一般皆認為這是戰爭所得的敵頭。但筆者認為，祭祀坑中的人種非常多元，與某一方國的戰爭豈能得到這麼多不同的人種？若是歷經幾次戰爭累積而來，這些不同時地捕獲、沒有立即用於祭告神祖的戰俘，又因何故在過了一段時間後，才被集中起來用於祭祀神祖？況且這種推論至少將產生三個疑問：其一，用戰俘祭祀乃戰爭後的大禮，甲骨文中有很多相關的記載，但這些記載卻都難以和同時採用不同人性的祭禮發生

^⑫ Kim Hayes, "On the Presence of Non-Chinese at Anyang," *Sino-Platonic Papers* (2004): 1-11.

^⑬ 楊希枚，〈河南安陽殷墟墓葬中人體骨骼的整理和研究〉，頁231-265；Carleton S. Coon, *The Story of Man: From the First Human to Primitive Culture and Beyo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4), 326-337。

^⑭ 韓康信、潘其風，〈殷代人種問題考察〉，《歷史研究》，1980年，第2期，頁89-98；韓康信、潘其風，〈殷墟祭祀坑人頭骨的種系〉，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殷墟頭骨研究》，頁82-108。

^⑮ 最近僅公佈在幾場口頭報告中，待真實公佈刊登。

關聯；其二，若不立即殺死戰俘，就必須養他們一段時間，可是資料上未見有將戰俘當作奴隸的相關記載；其三，祭坑中的人骨測試，出現了很多楚科奇、愛斯基摩等黑龍江以北的東北人種，但是甲骨文記載中未見往東北方向用兵的文例。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398具頭骨中有戰俘，但將其全部視為戰俘或「奴隸」，將產生很多難以理解之處。這些人牲未必全是戰俘，也可能是王族的僕婢、先王的寵臣，或者有其他可能性，例如新王就位時，殺害與其為敵的貴族派系，等等。398具頭骨合葬的原因有很多，我們不能以為人性或殉葬者的身份一定都很低微，他們反而經常是與王室親近的寵臣、寵姬等人。所以楊希枚除了戰俘的說法外，也推論這或許是「殷先生前寵倖的陪臣，甚或宗屬。……就西史所載，Scythian 人曾有以宗屬獻祭於先王的習俗」。^⑯早期的社會均有以親密的宗屬殉葬或作為人性的習俗，包含配偶、弟妹、小兒女等，這種傳統早已不復存在，因此從現代人的想法來看，被殺者一定是敵人，但在商代社會中，以親屬殉葬或獻為安靈才是正常的。

我們顯然不能肯定地說：西北岡祭祀坑的人骨便一定與王家有着密切關係，但是，若從文化背景來思考的話，筆者認為這種假設或許是最近乎可能的情況。有許多族群的傳統文化皆認為，自然死亡（尤其是病死）對永生有害，只有在戰場或祭祀場被殺死的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崇高生命價值，並進而獲得升天。自然死亡的人，生命力量已經竭盡，故無法升天，有些族群迄今仍保留這種信仰的痕跡。^⑰其中在西北岡所見的楚科奇人，恰好認為在戰爭或祭禮中被殺死才屬「善死」，老死或病死屬「惡死」，這種觀念尚存在於楚科奇人的民間信仰中。同時甲骨文資料闡明，在殷商信仰中，人性被當作「巫」。^⑱因此，除了戰俘之外，常有社會地位很高的人被獻給自然神或祖先。

換言之，筆者認為，西北岡的人牲應與王室關係密切，屬於殷商王族家屬和親近的人。人類學的研究顯示，組成殷商王室的血統相當廣泛，不僅有現代中國境內的人種，還有跨及北亞、太平洋、高加索等地區的人種。

西北岡的398具頭骨中，確定有80具屬於黑龍江流域以北的東北民族。據

^⑯ 楊希枚，〈河南安陽殷墟墓葬中人體骨骼的整理和研究〉，頁237。

^⑰ James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London: Macmillan, 1925).

^⑱ 周鳳五，〈說巫〉，《臺大中文學報》，第3期（1989），頁269-291。

楊希枚的測試，西北崗以外的大墓中，也常出現北方草原古典蒙古人種的骨骼。¹⁹ 韓康信和潘其風對殷墟小型墓的研究顯示，其比大型墓和祭祀坑頭的變異性為小，²⁰ 是因為大部份小墓是代表本土原有的人種基質，而大型墓的墓主均是殷商高等貴族，經常屬於王室宗族，所以遠地集聚的多元性以及黑龍江流域以北的成分，基本上是殷商高等貴族所有。此外，侯家莊西北崗1400號大墓發現銅面，據發掘者的人類學研究認為，這種面孔應是東北亞人種，²¹ 燕南劉家河和琉璃河遺址中，恰有同類型的面具。²²

據體質人類學和考古學的資料指出，殷商王族來自黑龍江以北的東北地區，甚至與東北亞沿海的民族也有血緣關係。語言學亦旁證殷人與愛斯基摩人的關係，漢高加索大語系另稱為德內高加索或德內漢高加索大語系，此即由於這個大語系另外涵蓋了北美洲原住民納德內語系，分佈範圍包括從中國到北美的沿海路線。學界早已論及，納德內印第安人是從北亞循着沿海線到美洲的。語系上的親近，即顯示殷商前後一直存有民族遷移而產生的分化關係。²³

其實，從甲骨文中未見記載殷王往東北方向出兵的文例，這也能夠為否定祭坑中的人頭為戰俘的說法補充證據，這一說法雖然普遍，但與實際資料相左。殷王極少往東北方出兵的記錄，可能即是因為東北方是殷商王族本身的發祥地。

¹⁹ 楊希枚，〈河南安陽殷墟墓葬中人體骨骼的整理和研究〉，頁242-246、257。

²⁰ 韓康信、潘其風，〈安陽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殷墟頭骨研究》，頁50-81。

²¹ 梁思永遺稿，高去尋輯補，石璋如校補，《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河南安陽侯家莊殷代墓地）·第九本·1129、1400、1443號大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6），頁75-76，R1116，圖版伍叁至伍陸。

²² 郭靜云，〈「大禾方鼎」尋鑰——兼論殷商巫覡的身分〉，《藝術史研究》，第13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頁75-112。

²³ Vitalij V. Shevoroshkin, ed., *Dene-Sino-Caucasian Languages: Material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 on Language and Prehistory* (Bochum: Universitätsverlag Dr. Norbert Brockmeyer, 1991); John D. Bengtson, “Edward Sapir and the ‘Sino-Dene’ Hypothesis,”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102: 3 (1994): 207-230; John D. Bengtson, “Materials for 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Dene-Caucasian (Sino-Caucasian) Languages,” *Aspects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3 (2008): 45-118; George Starostin, “Dene-Yeniseian and Dene-Caucasian: Pronouns and Other Thoughts” (Berkeley, California: Athabascan/Dene Languages Conference, July 10-12, 2009). 此外還有西班牙東北山區巴斯克(Basque)民族的語言也屬於德內漢高加索大語系，但其傳播關係有些疑問。

至於祭坑中所見太平洋人種，則源自太平洋沿海的文化交流路線。研究河姆渡及良渚文化的學者早已論及這一問題，從新石器時代以來，這條路線往南可到達南洋地區，向北通往楚科奇半島，現今在山東、遼東、朝鮮、黑龍江省、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等北方沿海地區，均留下了來自南方海岸的文化遺跡。因楚科奇地區的黃種人和來自南海的黑種人早已有來往，所以兩者皆可見於殷人的族群之中。因此，將殷人視為東夷的傳統理解，並非毫無根據。同時殷人將其始母稱為簡狄也可視為神話中的事實轉化：從中原人的角度來說，殷人確實是東北方向來的夷狄。^㉔

據人類學家分析所得的人種比例來看，殷商的人種來源是由北蒙為主，其次尚包括了南洋、白種人等。北蒙人與白種人的來往地域，應該是北蒙及黑龍江草原區；至於北蒙人與南洋人的來往地域則應在黑龍江入海口的南方海岸。這也是殷商王族的發祥地所在。位於黑龍江流域和殷溪之間的遼西大甸子夏家店下層的青銅早期文化，亦可證明殷商王族是從東北進入河北平原的，大甸子遺址也出土了許多不同類型的人骨，與殷墟墓葬裡的情況頗為相似。^㉕

三、殷人與白種人接觸的依據

西北岡祭祀坑出土的398具頭骨中，至少有兩具女性頭骨確定屬於高加索人種。楊希枚懷疑，有一些被定為北寒帶類古蒙古人的，其實比較像古北歐洲人種（愛爾蘭人），或者屬於高加索或混血人種；^㉖此外，孔恩認為頭骨中還有數具黃白種混血的。^㉗另有38具，被楊希枚和孔恩分為第五組而未定其人種，但最近被已 Kim Hayes 認定為中亞草原白種人。^㉘殷商王族與高

^㉔ 《史記·殷本紀》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頁49。簡狄的「娀」氏，或許另可理解為「戎」，不是族種，而是征伐或兵車的意思。《詩·秦風·小戎》曰：「小戎俴收，五駉梁輶。」毛傳曰：「小戎，兵車也。」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頁653。

^㉕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與墓地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頁224-322、圖版五七至六二。

^㉖ 楊希枚，〈河南安陽殷墟墓葬中人體骨骼的整理與研究〉，頁231-266。

^㉗ Carleton S. Coon, *The Story of Man: From the First Human to Primitive Culture and Beyond*, 326-337.

^㉘ Kim Hayes, “On the Presence of Non-Chinese at Anyang,” 1-11.

加索人種曾有接觸是毫無疑問的。殷墟考古和甲骨文都能證明殷商王族與白種人來往。

上文已提及，將祭祀坑人頭視為外來戰俘的普遍說法，實際上只是以現代人的觀念解釋青銅時代的遺址。從當時的文化脈絡來看，他們最有可能是與王室親近的寵臣、寵姬，其中很多是王室宗族。此外，在殷商信仰中，人牲被當作「巫」，因此，除了戰俘之外，常有社會地位很高的人被獻給自然神或祖妣。

西周早中期周原扶風召陳遺址出土了兩件蚌雕白人頭像形的禮器。頭像為長臉、高鼻深目、窄面薄唇，都是白種人的外貌特徵（附圖3、4）。一號頭像的頭頂有刻「巫」字，顯示西周時期亦依循殷商的觀念，將白種人當作「巫」。²⁹ 上海博物館博收藏的西周早期車轍，其形狀為虎神吞噬白種人頭（附圖5），³⁰ 其構圖的意思是神獸吞噬巫師的神秘過程。³¹ 夏含夷認為這種造型表達當時對白種人有相當深刻的認識。³² 但筆者強調，這種虎神吞噬構圖再次表達了以白種人作為巫師的祭禮。殷商考古顯示，殷商王族早已認識與本地不同的各種人種。

甲骨文資料也能旁證某些商王的配偶是白種人，所以王家中黃白混血的現象必不罕見。裘錫圭在甲骨文資料中也曾發現殷商王族與白種人混血的情況。卜辭曰：

己亥卜，□（王？）：子白癸³³ □毓，不□（其？）白？
(《合集》3410³⁴)

甲申卜，惟白子？(《合集》20285)

²⁹ 陳全方，《周原與周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圖版十二；尹盛平，〈西周蚌雕人頭像種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1期，頁46-49。

³⁰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220-221，圖二九二。

³¹ 郭靜云，〈「大禾方鼎」尋鑰——兼論殷商巫覡的身分〉，頁75-112。

³² 夏含夷，〈公元前1000年前後東西文明交流三則〉，《華學》，第九、十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88-290。

³³ 此字殘缺，裘錫圭認為是「羌」，姚孝遂和肖丁認為是「癸」，見姚孝遂主編，肖丁副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384。經過詳細對照該字型所剩部份，筆者贊同其為「癸」字的說法。

³⁴ 郭沫若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以下引作《合集》。

裘錫圭解釋，「子白」或指商王之子所「幸」的白皮膚女子。「子白」即在生育之前卜問所生之子的膚色是否白色的卜辭。「如果上面的解釋大致不誤的話，殷王室血統中是否可能含有少量白種人的成分，都是可以研究的問題。」^⑤

《合集》20081-20083和20463還出現了一位殷王的配偶稱為「婦白」。殷王配偶的名稱都以「婦某」，如果沒有上述的資料，或可以為「白」只是她的美稱而已，但與上述資料對照後，或許「婦白」是指白皮膚的寵姬。部份學者已經開始思考，「白」是形容膚色偏白皙的美人，或具體指白種人？因墓骨中確實有白種人的骨骼，基本上可以推斷為白種人的意思，羅益群、裘錫圭、朱楨都認為這就是指白種人。卜辭中出現白人的比例不多，墓中出現白種人的骨骼同樣也不多。

卜辭中記有載婦白被獻於先王之事：

□（甲？）寅卜，王貞：惟丁巳□婦白於大丁？（《合集》20083）

卜辭記載丁巳日要獻婦白於大丁，即將姬妾獻於先王。抑或西北岡白種女人頭骨中，正好有婦白之骨？至少卜辭中記錄的事情應與西北岡所能見到實物相近。所以筆者認為，將398具頭骨視為與王相近的人應該比較恰當。

甲骨文中另有數次透露對白人、白族、白地的記載：

……白人歸於……（《合集》452）

戊申卜：白降禍？（《合集》16475）

羅益群推斷：「『白』只能是族名或因族人之特色而得名的地名。……殷武丁時，白、殷之間發生過糾紛、爭鬥，因此殷王武丁曾憂心忡忡地卜：『白是否會降禍於我？』？」^⑥ 卜辭中既有用白人來火祭，亦有在白地祭遇成湯、

^⑤ 裘錫圭，〈從殷墟甲骨卜辭看殷人對白馬的重視〉，《殷墟博物苑苑刊》，創刊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70-72。

^⑥ 羅益群，〈殷商時期白種人在中原的足跡考〉，《河北學刊》，1985年，第4期，頁75。

妣庚地位很高的祖先。

己丑卜，□貞：燎白人？

燎白人？（《合集》1039）

王曰：則大乙敷於白……（《合集》35501）

其叔妣庚在白？（《合集》27529）

另有在白地卜旬、卜雨以及打獵的記載：

癸未卜，在白貞：王旬，王咎？（《合集》36794-39797）

貞：不雨在白？二月。（《合集》12523）

庚子卜，王往田於白？（《合集》33425）

古代文獻中也有白種人之國出現的端倪，如《山海經·海外西經》曰：「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披髮。」《淮南子·墮形篇》曰：「海外三十五國……白民……」高誘注云：「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³⁷ 羅益群和朱楨認為，「披髮而膚色白皙，自然是白種人無疑了」。「抑或上古之時已有白色人種已居住於殷商王朝疆域鄰近不遠的地方而與殷人發生了某種關係？」³⁸ 依筆者淺見，文獻所指出身上披髮的特徵，甚至比白身還重要，因為只有高加索人種（尤其是南系閃族、伊蘭族等）為白身披髮。

「白人」之外，卜辭中還有「白羌」用作祭牲的文例：

戊子卜，旁貞：車今夕用三白羌於丁？用。（《合集》293）

三白羌……（《合集》296）

三白羌用於丁？（《續編》2·16·3³⁹）

³⁷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25；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356。

³⁸ 羅益群，〈殷商時期白種人在中原的足跡考〉，頁75；朱楨，〈「殷人尚白」問題試證〉，《殷都學刊》，1995年，第3期，頁10。

³⁹ 羅振玉編，《殷虛書契續編》（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0），卷2，頁16。

□亥卜，……毚^⑩三人白……其用於……祖丁、父甲……
 (《合集》26925)

又有些碎片僅保留「白羌」二字。有關在此處「白」字的用意看法不一，瞿潤緝以為「百」，^⑪王慎行也將「白」當作「百」來讀，^⑫但是大部份學者贊成姚孝遂的說法，稱人時所說的「白」字，應均指皮膚的顏色而言，^⑬尤其顏色在殷商信仰和祭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而白色在其中又特別突出。朱楨論述：「字當如字讀，即釋用『三白羌』（三個白羌人）。其實，甲骨文『白』，『百』，二字字形絕不相混。……『白羌』、『白人』之用為祭牲，正如『白牛』、『白羊』、『白豕』一樣。」^⑭況且，《合集》26925有「三人白」一句，更足以證明「白」要讀如本字而非「百」字。

學界大多同意上述紀錄都是指涉白種人，但認為「白人」與「白羌」應視作同一種民族。然筆者懷疑，甲骨文中有「人方」之國，「人」字可讀為「尸」和「夷」（尸方、夷方），所以「白人」可讀為「白夷」，但最有可能是「白方」之人。《山海經》所言：「白民之國」實際上有兩種，地域不同。《大荒東經》另言：「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西、東方都有白民之國，袁珂將兩者視為不同的國家。^⑮根據考古資料，青銅時代從哈薩克草原到蒙古草原都是高加索人的生活範圍。

有關「白羌」，朱楨認為，「白羌」或是白種人與羌人的混血種，^⑯此說亦可參照。

提及羌族的卜辭很多，但除了「白羌」之外，本人特別注意到「馬羌」一族。卜辭曰：

^⑩ 王慎行認為，「毚字則象以繩索系縛羌人頸項之形，便於引牽，羌俘之狀維肖維妙」。王慎行，〈卜辭所見羌人考〉，《古文字與殷周文明》（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頁122。

^⑪ 瞿潤緝的看法見引於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卷6，頁2595。

^⑫ 王慎行，〈卜辭所見羌人考〉，頁129。

^⑬ 姚孝遂，〈商代的俘虜〉，《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378。

^⑭ 朱楨，〈「殷人尚白」問題試證〉，頁10。另參郭靜云，〈幽玄之謎：商周時期表達青色的字彙及其意義〉，《歷史研究》，2010年，第2期，頁4-24。

^⑮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347。

^⑯ 朱楨，〈「殷人尚白」問題試證〉，頁10。

丁亥卜，方貞：車羽呼小多馬羌臣。十月。（《合集》5717）
 ……多馬羌臣……（《合集》5718）
 □寅卜，方貞：令多馬羌禦方。二告。（《合集》6761）
 貞：令多馬羌？（《合集》6762）
 勿令多馬羌？（《合集》6763）
 乙卯卜，爭貞：王□伐馬羌……（《合集》6624）

王慎行認為，「『馬羌』，或疑其善養馬、馴馬而得名；或疑以馬為圖騰。後世的『白馬羌』疑即馬羌之苗裔」。^⑯ 殷人在中原「定居」後，他們附近已沒有養馬的條件，所以他們必須從草原民手中奪取或買得馬匹，這與加喜特族在兩河流域的情況相似。

總而言之，考古及甲骨文資料均顯示，殷商王族與高加索人種曾有過各種關係，包括發生爭鬥、殷人以白種人作為祭祀神靈的人牲；殷王室求取於白種部族的美女為諸婦者，使王族中帶有高加索人的血統。根據西北岡坑考古資料可知，除白色人種外，殷人與太平洋黑色人種也有關係，然而卜辭中只提及白種人，記載與白色人種的交往情況。可推知，應只有白種人受殷王室的重視，與殷商王族有親密關係。有關殷人與白人產生聯繫的地點，羅益群推論，「某一支白種人部族曾深入中原，與商王朝發生直接交往」。^⑰ 可是考古資料並不足以支持這一說法，因為中原地區發現的高加索人骨極少。依筆者淺見，殷商王族與高加索人互動的舞臺主要是亞洲草原地區，新石器晚期、青銅時代的草原地區都是高加索人的活動地界。^⑱

有關殷墟高加索人的族屬，學界一般認為在商周時期，伊蘭族的一支曾

^⑯ 王慎行，〈卜辭所見羌人考〉，頁117。「白馬羌」見《後漢書·西羌傳》。

^⑰ 羅益群，〈殷商時期白種人在中原的足跡考〉，頁75。

^⑱ Алексеев В. П. “Палео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Алтая-Саянского нагорья эпохи неолита и бронзы.”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II*. М., 1961 (ТИЭ, т. 71), с. 107-206; Алексеев В. П.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древнейшего европеоид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Минусин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ы.” *Вопросы этнографии Хакасии*. Абакан, 1981, с. 4-10; Соловьевников К. Н. “Материалы к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афанась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Древности Алтая*, 2003, no. 10, <http://e-lib.gasu.ru/da/archive/2003/10/01.html>; А. А. 科瓦列夫、Д. Герберт涅巴特爾著，邵會秋、潘玲譯，楊建華校，〈蒙古青銅時代文化的新發現〉，《邊疆考古研究》，第8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246-279。

活動於甘北、陝西部一線，通過鬼方與商周發生關係。⁵⁰ 無疑地，這一條經中亞到甘肅再到陝西，與白種人交流及文化傳播的路線，自青銅器早期或更早以來即已存在。可是筆者以為，殷商王族並非僅通過甘北才能接觸到白人，早在他們生活於東亞草原之時，即已接觸過中亞的草原民，以及更遠的高加索人種，甚至有些中亞草原民融入了殷商的團體，殷商王族也曾娶白種女人為妻室，因而後裔中有部份白種血統的成份。

筆者注意到，大部份白人和白羌的紀錄都出現在武丁的卜辭中，即在殷商王族入中原前期，這或能旁證殷商王族之與高加索人產生聯繫，是延續自他們在發祥地已有的關係，而非到了中原才開始。

四、總結

根據人類學的研究，殷商王族的人種屬性源自東北方，以北蒙（楚科奇、愛斯基摩）人種為主、南海人種為輔，並帶有少數白人血統。北蒙人與白種人的來往地域，應該是北蒙及黑龍江草原區；至於北蒙人與南洋人的來往地域，則應在黑龍江入海口的南方海岸。筆者推測這也是殷商王族的發祥地。所以歷來將殷人視為東夷的傳統理解，並非全無根據；同時殷人的始母被稱為簡狄，也可視為神話中事實轉化的部份：從中原人的角度來說，殷人確實是從東北方向來的夷狄。所以體質人類學考古的研究，能夠旁證學界所流行殷人來自東北方向的學說。⁵¹ 東北遼西大甸子夏家店下層青銅早期文化，相當符合表現殷商王族從東北下來河北平原的路線，夏家店下層在大甸子遺址也出土了許多複雜合體類型的人骨，與殷墟的墓葬裡異種系人骨頗為相似。⁵²

⁵⁰ 羅益群，〈殷商時期白種人在中原的足跡考〉，頁7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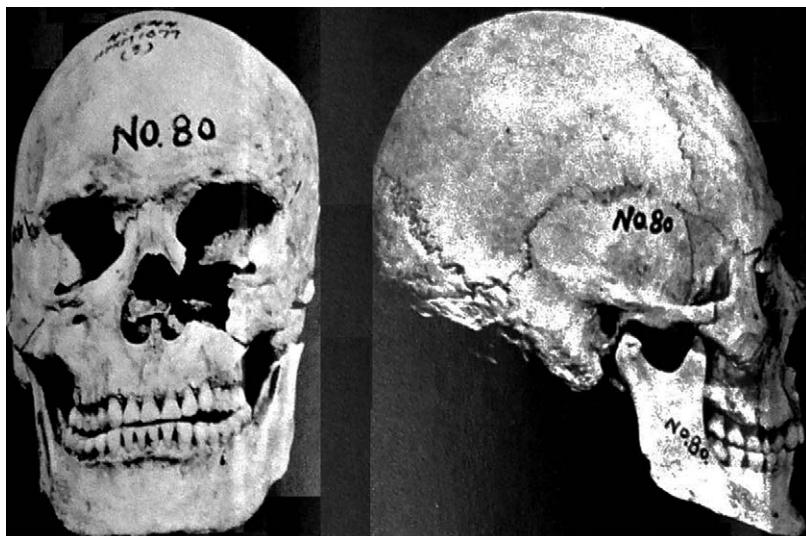
⁵¹ 主張東北方向說的學者之間，其意見可進一步分為東北說、河北說、京津說三種。雖然針對殷商的發源地還有更細微的歧見，但從殷墟的地理位置來看，無論是遼西至京津區的夏家店文化，還是河北下七垣文化等，都位於同一條文化傳播及民族移動的路線上。因此，筆者主張合而論之，以傳播的方向來作討論。主張東北的學說，除了筆者之外，還有徐中舒、丁山、傅斯年、蘇秉琦、林澨、干志耿、李殿福、陳連開、楊錫璋、黃中業、晁福林、郭大順、曹定雲、李伯謙、朱彥民、Gideon Shelach、胡厚宣、李業農、金景芳、翦伯贊、張博泉、藺新建、王明閣、張渭蓮等學者。

⁵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與墓地發掘報告》，頁224-322、圖版五七至六二。

然而殷商王族也有頗關鍵的西來成分，早期在草原族群的互動中，廣泛接觸了亞洲草原的族群，其中也包括了草原白種人，又娶得中亞高加索種的配偶。或許透過草原族群由西向東的傳播活動，中國境內始見一些西來的兵器、禮器等文物的製造類型。同樣因這些互動，可能也有一些自東往西去的因素。實際上許多現有資料均顯示在公元前15世紀前，已有歐亞族群互動及互相影響的情況。殷商王墓人骨研究為此提供了線索。在北蒙及黑龍江草原，自古以來可見各類黃、白人種的來往，或可謂之為歐亞數次新族群的發生、民族遷移的發祥地。

(責任編輯：周驚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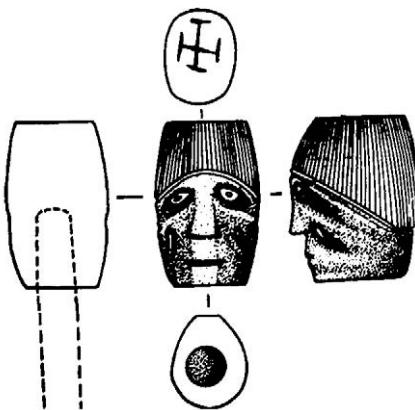
附圖1：殷墟西北岡高加索女人頭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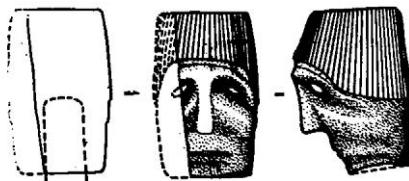
附圖2：殷墟西北岡出土古代中亞草原白種人頭骨



附圖3：一號蚌雕白人頭



附圖4：二號蚌雕白人頭



附圖5：西周早期的車轍：虎神吞噬白種人頭



The Shang Dynasty Rulers were A Migrant Ethnicity: Ethnic Diversity in the Formative Stag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lga GORODETSKAYA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ave shown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first emerged in the river basins of the Yangtze and its northern tributaries, the Huai and Han. Some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the lower Han basin already had multiplicities that integrated and allied with one another to form state structures. In this period the inhabitants of what is now north China were mostly nomadic an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region was fluid. Some thirty-five hundred years ago, more complex forms of political authority gradually developed in north China. One consequence of this was that southern cultures were relegated to a secondary and subordinate role in the historical orthodoxy that developed subsequently.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hang sites at Anyang reveals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Shang culture. Objects excavated as Shang sites come from very broad origins, extending south beyond the Yangtze, to the forests and steppes in the north, to Sichuan and Gansu in the west, and to the sea in the east. The Shang period was the source of

Olga GORODETSKAYA,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Min-Hsiung, Chia-Yi, 62102, Taiwan, R. O. C.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Province, P. R. China. E-mail: hisjyk@ccu.edu.tw.

many elem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 including the earliest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ang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politically centralized state; transcending the limits of a single ethnicity, encompassing places with different styles of lif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languages. Political authority was exercised over numerous earlier city-states. It thus formed an enormous diverse civilization, earning it the title of “ancient empire”. The new weapons and horse-carriage technology that were the symbols of the Shang ruling clan demonstrate that they were not native to the region, and that a considerable element of Shang culture came from the northern steppe. Linguistic data also shows that the language of Shang retained significant Altaic elements. This article uses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data to explore the close links between the early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peoples of the northern steppe. It argues further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Yellow River plain, the rulers of the ancient Shang empire belonged to an ethnic group from elsewhere.

Keywords: Shang ruling elites, physical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of the Shang dynasty, ancient migrations, oracle bones